

A Study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抗日战争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陈剑敏 / 著

 人民出版社

A Study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抗日战争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陈剑敏/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武丛伟

美术编辑:王欢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陈剑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01-018410-4

I. ①抗…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1931-1945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7541 号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KANGRI ZHANZHENG SHIQI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YANJIU

陈剑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75

字数:216 千字

ISBN 978-7-01-018410-4 定价:5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6MK005）最终成果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	26
一、抗日战争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的奠定	27
(一) 国民革命时期初步的探索与实践	27
(二) 土地革命时期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	35
(三) 1927年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的传播与影响	42
二、马克思主义何以需要实现中国化	51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的需要	51
(二) 国共两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需要	57
(三)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发展的需要	61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推进	66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化”思潮的兴盛	66
(二) 抗日战争造成了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	72
(三) 延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79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轨迹	90
一、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动	91
(一) 瓦窑堡会议上的萌芽	91
(二) 瓦窑堡会议后的初步展开	95
(三) 六届六中全会上命题的正式提出	98
二、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102
(一)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内领导群体的反应	102
(二) 延安整风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助推	110
(三) 共产国际解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119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力	127
一、毛泽东对推进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128
(一)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开拓者	128
(二)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诠释者	132
(三)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奠基者	136
二、其他领导人对推进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141
(一) 张闻天的贡献	141
(二) 刘少奇的贡献	147
三、延安知识分子对推进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155
(一) 延安知识分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55
(二) 延安知识分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	160

(三) 延安知识分子系统总结和宣传了毛泽东思想	166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路径和内容	170
一、努力学习理论, 提高理论素养	171
(一) 大量译介马列原典著作	171
(二) 重视理论学习,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改造	177
(三) 创办报刊和各类干部培养学校, 重视干部培养	180
二、注重调查研究, 加强国情认识	186
(一) 中国共产党人对开展调查研究的倡导和推动	186
(二)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之实践情形	191
(三) 调查研究之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195
三、发起大众化运动, 服务人民群众	200
(一)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倡导和推动	200
(二) 中国共产党推进大众化的具体措施	203
(三) 大众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210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实践	215
一、毛泽东民主革命理论体系构建的完成	216
(一)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系统化	216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的提出及理论的建构	219
(三) “三大法宝”理论子系统的提出	223
二、毛泽东党建理论、军事理论的构建	227
(一) 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227

(二)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234
三、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和学术体系建设的思想与成就	240
(一) 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思想及其实践	240
(二)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初建	251
结 语	265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92

导 论

一、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其理论的中国民族化，并实现中国经验理论化的过程与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纳入中国人视野，开始被中国知识精英逐渐认识并宣传的过程。这时，马克思主义主要在书斋里传播，被人们作为一种纯粹的学说在探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备时段。第二层次是指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出书斋，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发生联系，日渐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推动中国社会根本变革，实现中国人救亡图存、救国富民理想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这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还处在“磨合期”，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基本在机械搬运理论于中国实际，常常犯下“削足适履”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也给反对者留下了攻击的口实。总体来说，这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在一种不

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这是它的初期时段。第三个层次是指马克思主义不再被视为是一种“死”的东西，只能“削足适履”套用的东西，而是被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运用，进入“改履适足”的新阶段，使其在原来基础上得到创新和发展。此时，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文化实现融会贯通，逐渐内化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也突破精英空间的限制，进入了普通大众视野。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上述三个层次不是一个简单的由低到高的线性推进过程，而是交叉进行，螺旋式递进，前一层次是后一层次的准备和跳板，后一层次是前一层次的延伸和发展，后一层次往往也包含着前一层次的内容。在不同时期，这三个层次有时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它们的主次地位表现不同。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主要是第一层次特征表现明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则是第二层次特征表现明显；抗日战争期间则是以第三层次特征表现最为明显。

抗日战争时期，经过前期的准备与摸索，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它已从不自觉状态、半自觉状态进入自觉状态，并发展成为一种集体共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抗日战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实现了中国化，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新阶段，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解放的根基，而且从思想文化视域来说，也因此开辟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路径。中国知识精英开始结束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间选择的纠结，不再照搬西方，也不再抱着自己的传统不放，而是批判地对待中国历史文

化遗产和外来思想，在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新学术文化体系。“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观察历史的重大转变，看研究对象是否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看它是否影响或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走向和历史命运。如果是，那它就是研究价值极高的问题，从而最值得历史学者的关注和探讨。”^①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影响了国家和民族发展走向的、值得历史学者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具体来说，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助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跌宕起伏之后，重整旗鼓，不仅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从此有了巩固的后方，而且很快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其他地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十九块根据地，近一亿人口，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所掌握的军事力量也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除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外，还有二百二十多万民兵，这些武装力量虽然没有先进的美式装备，但普遍士气高昂，非国民党军队可比。根据地政治上的清明廉洁，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条不紊，广大民众振奋的精神面貌，都和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到过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和观察家都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如美国海军武官上尉卡尔逊就相信，只有八路军才能挽救中国，打败日本，称赞“中国共产

①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党为中国最进步的民主势力”^①。而且，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方面的种种探索，事实上奠定了新中国的根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能够取得这些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话语的确立和实践行动的展开是分不开的。因此，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让我们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时代背景、历史作用、内容体系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以更好地继承历史遗产，进一步坚定我们对中国道路和理论的信念，继续在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对和解决新时期出现的现实问题。当今中国，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红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年轻人理想信念的缺失，大众道德的滑坡，部分地区奢靡之风、不正之风的盛行，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阶层的固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日益尖锐，等等。在这些危机和挑战面前，如何成功化解危机，积极应对挑战，巩固执政地位，提升执政能力，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存亡、中国民族兴衰和亿万人民福祉的大问题。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面临着同样严重的危机和挑战，一方面要坚持抗日，追求民族解放，同时要应对来自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打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存在；另一方面党内教条主义思想严重，宗派斗争不断，共产国际横加干涉，党员成分复杂，党内思想混乱，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封建意识的影响，民众文化教育的落后，

^① [英] 费雷达·阿特丽：《扬子前线》，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201页。

使中国共产党的处境无比凶险。但是，中国共产党最终成功化解了各种危机，不仅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还奠定了此后执政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基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全面确立与实践。因此，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以应对今天党和国家面临的新问题，继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探索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新道路。

第三，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1938年10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和概念被正式提出后，党内外人士对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表示认同和支持，有人公然质疑和反对，还有人半信半疑。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反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这一命题，在“学术中国化”的旗号下，就曾经展开过激烈论战和交锋。20世纪50年代后，因为政治层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很少再用^①，学界对其讨论也一度沉寂。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严重迷误后，再次深刻认识到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重要性——不仅在革命时期需要走自己的道路，就是在建设时期也必须如此。于

①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此后相当长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两种提法同时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策略考虑，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只使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度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原因，有“外部压力说”、“主动变通说”、“提法不科学说”和“策略说”四种，笔者认同“策略说”这种观点。具体参见李建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112页。

是,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始,学术界开始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是有大批关于这一问题的著述成果面世,学术界对这个沉寂多年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著述、讲话中,也开始不断强调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但是,伴随这一问题再次获得主流政治话语权、兴起新一轮研究热潮,学术界对它的争论也再度展开。“迄今仍有质疑这一命题正当性的声音存在;主流政治和理论话语之外,还有着众多‘非主流’的看法和评价,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实用化、儒家化、庸俗化、农民化等等。”^①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学术研究仍然是必要和必需的。

“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②对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专门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些基本问题,更好地认识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及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给予这一热门议题一个公正评价,以推动现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二、研究现状

关于抗日战争时间的界定,学术界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

^① 李建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② 吕思勉:《中国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版,“绪论”第5页。

认为是从1937年到1945年,共八年;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从1931年到1945年,共十四年。本书界定的抗日战争时期,取前种观点,指1937年至1945年,但是因为研究内容的需要,并不严格限制在这八年之间,它的上限和下限都会有所延伸。本书中所谓抗日战争时期,基本可等同于中共党史上的延安时期。因此,本书界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从时间段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众多学科的热门研究对象,已经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成果中,以间接涉及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为多,而直接研究这一问题的不多。

(一) 著作

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著作,粗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系统的宏观研究,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姑且称之为“通论”类著作;一类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某一问题或从某个角度进行中观、微观研究,姑且称之为“专论”类著作。

1.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论类著作。

“通论类”著作的研究论域与论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已启动,但对其历史分期却有不同意见。杨奎松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革命的工具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便已经开始了;但

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止了,“在70年代末终于又开始了”^①。以龚育之、石仲泉为首的专家团队,同样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二者“总体上说是同质的”,但该书没有完全按党史分期划分,而是大体上以30年为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个时期,认为不同时期它有不同的特点和主题。^②许多通论性著作都采纳了这种“三个分期说”观点:如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不同的是,该书把第二和第三个分期的年限提前到了1976年;黄宏、张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也基本借鉴了这种观点,该书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统一起来,认为1919年至1956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期,1956年至1976年是其曲折发展期,1976年至今是其第二次飞跃期;顾海良总主编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③,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分为1919—1949年、1949—1976年、1976—1992年、1992年至今四个时期,认为在这四个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别有不同的主线和主题,并取得了不同的成就。该书研究时段之长,研究内容之细,是现有通论类著作中少有的,在这本书中,新中国成立显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且其研究重点也从民主革命时期转向了社会

①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23页。

② 参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到现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三个时期。

③ 参见顾海良总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主义建设时期。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主要有过程论、结合论和两化论或多化论等观点。过程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结合”过程；是“共性理论与个性化经验相结合”的过程；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过程^①。龚育之、石仲泉等专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当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继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具体化、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的同一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化四个方面。^②而大多数学者都主张结合论，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使之在中国具体化，并形成自己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肖浩辉、王令金、李建勇、梅荣政、黄宏等学者^③，都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具体表述方式上有所不同。

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与动机。王健在其论著中，从理论基础、实践基础、文化基础、理论根据、现实根据、历史

① 参见王明生、尚庆飞：《思想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17 页。

② 参见何继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 页。

③ 参见肖浩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王令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版；李建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版；梅荣政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黄宏、张彬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凤凰出版社 2011 年版。